

# 物質基礎、理念慣性：中國「王道」 戰略文化的實證檢驗 1838～1842\*

楊 仕 樂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

## 摘 要

中國戰略文化 (Strategic Culture) 的研究，是當今現實主義 (Realism) 與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間理論爭議，與如何面對崛起中國政策辯論的交會點。依循現實主義的傳統，崛起後的中國將走向侵略擴張、破壞體系穩定；但從建構主義的觀點出發，現實主義純物質的見解則被認為是忽略了文化對行為的作用，是只基於西方經驗的片面斷言。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戰略文化，是中國「王道」與西方「霸道」的差別，如果不考慮中國此一戰略文化的獨特性，將不能瞭解中國的戰略行為。只不過，這種「王道」與「霸道」之別的見解，往往缺乏嚴謹的實證檢驗。目前雖有研究嘗試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宋、明兩代的歷史紀錄，視這兩個朝代為中國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案例，來駁斥這「王道」不同於「霸道」的論點，但這樣的實證研究仍然只佔相對的少數，且亦存有概念與方法上的缺陷。「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究竟有沒有影響？本文將採取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針對「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真正最可能成立的晚清時代，以鴉片戰爭為案例，嘗試對這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焦點問題提供解答。

**關鍵詞：**現實主義、建構主義、戰略文化、物質、理念、武力使用

\* \* \*

## 壹、前 言

中國的「崛起」，從 1990 年代以來就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所最為關心的課題之一。<sup>①</sup>「崛起」後的中國將會如何行事？依照國際關係學界中現實主義 (Realism) 的

---

\* 本文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計畫編號：NSC 99-2410-H-343-004-/NSC100-2410-H-343-004-) 部分經費之補助，謹此致謝。

註①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3), pp. 59-74.

傳統，一個興起的強權往往會走向侵略擴張，危害世界的和平穩定，在此中國也不會例外。<sup>②</sup>然而，在同一時期內，現實主義的傳統見解，也日益受到新興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風潮的挑戰，只注重相對權力起落此一外在客觀物質環境的分析，被認為是忽略了文化對國家行為的重要作用。<sup>③</sup>以中國此一主題而言，若指中國將因興起而引起衝突與戰爭，是只基於西方經驗的片面斷言。中國與西方其實有著不同的「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簡而言之是中國「王道」與西方「霸道」的差別，如果不考慮中國此一在戰略文化的獨特性，將不能瞭解中國的戰略行為。

只不過，這種「王道」與「霸道」之別的見解，往往只有空洞的主張，加上自由的隨機舉證，缺乏嚴謹的實證檢驗，正反見解之間常陷於各說各話，反映著戰略文化研究多年來的窠臼。<sup>④</sup>期間，是有研究嘗試突破這樣的缺失，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中國歷史上的證據，以「王道」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宋朝、明朝為例（most likely cases），來駁斥這「王道」不同於「霸道」的論點，也確實將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sup>⑤</sup>但這樣的實證研究仍然只佔相對的少數，且仍存有概念與方法上的缺陷。「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究竟有沒有影響？為了解答這個圍繞中國戰略文化的焦點問題，本文將提出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指出清代才是「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真正最可能成立的時代，並據此進行實證研究。

本文將分為三大部分進行。首先，本文概略回顧迄今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及其缺陷；接著，本文提出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不同觀點與研究設計；最後，本文再以晚清鴉片戰爭為案例進行實證檢驗。從中本文發現，在鴉片戰爭期間，儘管並無全面、壓倒性的證據支持「王道」解釋，但確實也有部分明顯的證據指出，清朝的行為確實有受到「王道」文化的影響。易言之，在此一中英戰爭中，「王道」的確扮演了角色，「王道」戰略文化確實存在。這樣的研究發現顯示，戰略文化的作用並不能全然排除，往後還需要進行更多詳細的案例研究，以進一步確定「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戰略行為的影響。

註② 目前，現實主義常被進一步分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與「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在此現實主義一詞是指與現實主義傳統立場相同的攻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性著作與其對中國崛起的預期，可參閱：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Yuan-kang W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March 2004), pp. 173~201.

註③ Michael C. Desch,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9), pp. 141~170.

註④ 對戰略文化研究的批評詳見：David M. Jones and Mike L. Smith, "Noise but No Signal: Strategy, Culture, and the Poverty of Constructiv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4, No. 6 (November 2001), pp. 486~487；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Autumn 2002), pp. 87~113.

註⑤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貳、中國戰略文化研究：文獻探討

### 一、研究的四個世代

「戰略文化」的概念，是由施奈德（Jack L. Snyder）在 1977 年針對蘇聯核子戰略的研究中所首創，其緣由一如當前對於中國戰略文化的關注。在冷戰期間，蘇聯為何好像有著與美國不同的核子戰略？在物質環境分析似乎無法提供答案之際，遂訴諸於文化的解釋。施奈德引用了人類學家克洛伯（Alfred Kroeber）與克魯洪（Clyde Kluckhohn）對「文化」的定義，將戰略文化界定為：「一國戰略社群的成員們，透過學習與模仿而獲得且彼此共有的一切觀念、受制約的情緒反應、與習慣性的行為的總和」。<sup>⑥</sup>儘管施奈德本人之後對此並未再繼續延伸，但戰略文化的研究卻十分蓬勃地展開來。<sup>⑦</sup>現今有關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可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江憶恩在 1995 年時就從戰略文化的意義，以及文化與行為間的關係為準，提出了戰略文化研究的三個世代，<sup>⑧</sup>做為他針對中國戰略文化進行研究的前奏，這樣的世代劃分在今天仍然十分適用。

第一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視戰略文化為一有關武力使用之長期累積、無所不包的概念，是一國一切理念（ideal）與行為（behavior）的總和、一種持續不變的特徵。主張中國具有「王道」式戰略文化的見解，大多就是採取這第一世代的觀點。例如張鐵軍（Zhang Tiejun）在 2002 年的研究即認為，兩千多年來無論是從思想著述、政治言論、還是對外政策的實踐來看，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特徵，就是強調和平、防守的「文化道德主義」（culture moralism）。<sup>⑨</sup>第二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則視戰略文化為一象徵性的語彙符號，作用是自我正當化並將敵人妖魔化。一些反對中國具有「王道」是戰略文化的見解，多少就留露出這樣的特徵。例如史高伯（Andrew Scobell）在 2002 年的研究即主張，當今中共認為自己基於中國傳統的戰略文化，是以和平、守勢為本質，而西方或日本的戰略文化，則是以暴力、擴張為本質。中共即使使用武力開

註⑥ Jack L.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pp. 8, 16.

註⑦ 戰略文化研究的另一個淵源，是 1932 年時李德哈特（Basil H. Liddell Hart）檢討了英國一次大戰的經歷之後，所提出的「英國式的戰爭方式」（British way of warfare）之說，也就是後來所謂一國從事戰爭時會有其「國家風格」（national style）的論點。不過施奈德以來的戰略文化研究鮮少與此重疊，雙方很少引用對方的著作。見：Lawrence Sondhau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13.

註⑧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註⑨ Tiejun Zha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 (April/June 2002), pp. 73~90.

戰，也是逼不得已的「自衛還擊」。<sup>⑩</sup>第三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則將戰略文化視為是基於近期經驗、相對易於改變，而且只含有理念的成分而將行為的成分剔除。許多著重於近代中共建政以來動武紀錄的中國戰略文化研究，無論是駁斥或支持中國有「王道」戰略文化的論點，都具有這第三世代的特徵。例如張曙光（Zhang Shu Guang）在 1992 年對 1949 至 1958 年美中軍事衝突的研究，<sup>⑪</sup>史高伯在 1999 年對中共介入韓戰，以及 2003 年對中共建政以來武力使用的研究，<sup>⑫</sup>或是馮蕙雲（Feng Huiyun）2007 年對中共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的思想分析。<sup>⑬</sup>

從江憶恩看來，這三個世代各有其優點，但也都未臻理想，不能真的澄清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之間的關係。第一世代的研究，顯然最接近戰略「文化」的本意，但缺乏學術研究應有的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既然文化是一切的總和與持續不變的特徵，則戰略文化的確切內涵不僅很難斷定，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之間的關係，也不免落入一切解釋一切、因果不分的套套邏輯（tautology）陷阱。第二世代的研究，則著重言行間的落差，可能切斷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為之間的關連。戰略文化的概念，變得像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一方面是可能因自我催眠而影響了行為，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只是行為之外的刻意包裝，其實是言不由衷。第三世代的研究，雖然符合了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在以文化解釋行為時避免了套套邏輯的問題，但也使得戰略文化的概念，變得像是決策組織甚或決策者個人的認知體系，而不再像是「文化」一詞本來的意涵。同時，就算只限定較短的時間範圍，戰略文化研究可能得分析的對象仍相當龐雜，包括政治家、哲學家、戰略家、政軍領袖等的著述與言論，教範操典與武器設計，甚至對外政策、戰爭計畫等等均含括在內。<sup>⑭</sup>從此觀之，江憶恩自己對中國戰略文化所進行的研究，其實是開創了與前三個世代都不同的取向，或可稱之為第四代的戰略文化研究：戰略文化是長期持續、近乎固定的，必須盡可能從一國最早的歷史經驗中去尋找，但其成分只包含理念而不包括行為，是一國戰略文化的理念解釋了一國所採取的戰略行為。<sup>⑮</sup>

註⑩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pp. 1~39.

註⑪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註⑫ Andrew Scobell, "Soldiers, Statesmen,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a's 1950 Intervention in Kor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November 1999), pp. 477~497;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⑬ 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7~35.

註⑭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 4~22, 39.

註⑮ *Ibid.*, pp. 39~40.

## 二、第四世代的研究

江憶恩主張，做為理念的戰略文化包含兩個元素：「一是提供有關人類事務中衝突的本質、敵人的本質、暴力的效能等三個基本但相關問題解答的核心典範，二是邏輯上從這些核心假設所推導出的一系列戰略偏好次序。」<sup>⑩</sup>至於如何依循此一定義，歸結出中國戰略文化的具體內容？一改以往戰略文化研究在觀察對象選取時籠統、隨機的態度，江憶恩精確選定了戰國時代以來陸續集成的中國戰略思想著述武經七書，做為分析對象。江憶恩發現，儘管他所稱孔孟式的（Confucian-Mencian）「王道」觀點的確曾在武經七書中出現，但多只有點到為止的象徵性作用，這七部中國戰略思想經典大體上都十分肯定武力的作用，並且強調攻守的選擇必須視情況而定，也就是「權變」的原則。因此，江憶恩認為中國擁有的其實是一種權力政治（realpolitik）式的「備戰」（parabellum）戰略文化，與西方的「霸道」並無不同。<sup>⑪</sup>江憶恩隨後以明代（西元 1368 至 1644 年）中國對外政策為案例研究，檢驗此一中國「霸道」戰略文化對於中國戰略行為的影響，並發現兩者之間的正向關連。「霸道」肯定武力的作用與攻守之間的權變，反映在明代的對外政策，是在明朝相對較強大時較具侵略性，相對較衰弱時則較為忍讓退卻，並藉此累積實力以重新轉回攻勢政策。因此，江憶恩主張，中國的戰略行為確實是受到中國戰略文化的影響，儘管明代的對外政策是符合現實主義的論點，但卻不是物質環境的直接作用而是戰略文化的結果，江憶恩遂稱之為文化現實主義（culture realism）。<sup>⑫</sup>

江憶恩的研究因其精確的定義與嚴謹的操作而廣受重視，但其文化現實主義的結論一方面雖肯定了文化對行為的作用，卻在另一方面也否定了戰略文化研究的價值。畢竟，如果在繁複文本分析得出一國戰略文化的內容之後，再從此一戰略文化所導出的解釋，還是與簡明的現實主義物質環境解釋相同，則在以簡馭繁的標準下，根本不必多此一舉訴諸戰略文化的解釋。同時，江憶恩從武經七書汲取出中國戰略文化的做法，也引起批評。王元綱（Wang Yuan-kang）即指出，從官員的養成、考選與決策權力的比重來看，就算是武官教育武經七書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真正重大的決策其實還是由皇帝與科舉出身的文官所控制，他們所熟悉的是四書這般的儒家經典。易言之，儒家經典中透露出的「王道」理念，才是中國戰略文化的真正樣貌。<sup>⑬</sup>從此，王元綱以明朝與宋朝（西元 960 至 1279 年）為案例進行研究，進一步駁斥中國「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的有效性、肯定現實主義解釋的優越。王元綱指出，宋明兩代是中國儒家

註⑩ *Ibid.*, pp. 33~34.

註⑪ *Ibid.*, pp. 27~30.

註⑫ *Ibid.*, p. 28. 江憶恩之後的研究也認為，此一戰略文化更一直持續至中共建政之後，見：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註⑬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pp. 24~27.

思想最鼎盛的時期，如果中國戰略文化對中國戰略行為真的具有解釋力，則「王道」戰略文化將最可能在宋、明兩代的對外政策上找到支持，如果在這兩個朝代都還找不到具體證據，幾乎就可否定戰略文化的解釋力。<sup>⑩</sup>

王元綱從有關使用武力、發動戰爭的三個重要問題，來檢視戰略文化對戰略行為解釋的效力。其一是使用武力：在機會來臨時，是否願意主動發動戰爭？其二是權力與壓迫：當權力相對上升時，一國是否會更具侵略性？其三則是戰爭的目標：是否超過單純的邊境防衛與現狀維持，並在客觀條件許可時追求完全的勝利？<sup>⑪</sup>對此，如果戰略文化能夠解釋戰略行為，則基於中國「王道」的戰略文化，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該是否定的：中國不會主動發動戰爭，較強大的中國將會較不具侵略性，即使發動戰爭、客觀條件也允許，戰爭目標也不會超過維持現狀。經過了實證檢驗之後，王元綱發現在宋明兩代，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卻全都是肯定的：中國仍然主動發動戰爭，且隨國力上升而愈加具有侵略性，也以徹底的殲滅與征服為戰爭目標，只因力有未逮才作罷。易言之，歷史證據有力地駁斥了「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的有效性，而全然符合現實主義的論點，說明現實主義實有超越文化差異的普遍解釋力。<sup>⑫</sup>

### 三、第四世代研究的缺憾

儘管獲得的結論正好相對，江憶恩與王元綱對戰略文化的研究都可算是第四世代，將戰略文化視為一種長期持續的理念、不含行為的面向，同時是以思想著述為戰略文化內容的主要根據。這種方式滿足了在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但仍存在一個未解的關鍵爭議，那仍是圍繞著「理念」與「行為」：當行為從戰略文化中剔除之後，戰略文化還是文化嗎？僅只是思想著述，無論是來自武經七書還是四書，就可以代表戰略文化嗎？的確，在江憶恩看來，如果文化是一切的總合，將不會有任何行為不是文化的結果：行為的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論點根本無法證明為偽（falsifiable），<sup>⑬</sup>因此有必要將行為從文化中剔除。但這在第一世代戰略文化研究學者葛雷（Colin S. Gray）看來，卻是為了研究方法的需要而犧牲了研究對象的本質。葛雷並不否認，如果一個概念沒有確切的定義而變得無所不包，則這個概念的確不具任何解釋上的意義，但如果為了精確界定戰略文化，而把它變成某種不再是文化的概念，這樣的做法未免是本末倒置。<sup>⑭</sup>又如羅德明（Lowell Dittmer）更直言，江憶恩以思想著述來呈現戰略文化，根本是沒有「文化」的「戰略文化」。<sup>⑮</sup>

註⑩ *Ibid.*, pp. 6~9.

註⑪ *Ibid.*, pp. 30~33.

註⑫ *Ibid.*, pp. 181~184.

註⑬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p. 12~14.

註⑭ Colin S. Gray, "Out of the Wilderness: Prime Time for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6, No. 1 (January 2007), pp. 2~3, 13~14.

註⑮ Lowell Dittmer, "The Culture of Structural Real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9, No. 1 (Winter 1997), p. 194.

可以這麼說，如果戰略文化在第一世代的研究中定義太寬，在第三世代的研究中定義太窄，則第四世代的研究以思想著述為標的、剔除行為的層面，則使得戰略文化變得一方面太過廣泛，另一方面又太過狹隘。太廣泛是指時間維度而言，思想著述在寫作完成之後可以持續存在千年之久，但在這漫漫的時間長河之中，其流傳與被接受的程度卻可能是起伏不定，如果以著述問世後固定的文字來呈現戰略文化的內容，不免誇大了這些著述的代表性。就如儒家經典著作是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但在此時只是「百家爭鳴」中的其中一家，到了漢朝才獲得獨尊的地位，而後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又受到冷落，再到宋明兩代而興盛。如此的興衰起落，適足以說明儒家經典其實不能代表中國持續的戰略文化特質。至於太狹隘則是指觀察標的而言。正因為思想著述的流傳與接受時有起伏，就算做為考試科目也未必真的深入人心而可以只是求取功名利祿的工具，唯有在文本之外再從實際對外政策的實踐來檢視，才能斷定思想著述的內容在某一段時期內是否確實瀰漫且浸透。因此，一旦觀察對象中剔除了行為的層面，可能就把戰略文化真正關鍵的內容也一併剔除了。

簡而言之，戰略文化研究所想要呈現的因果邏輯是文化解釋行為，故文化與行為必須是分開的；但若行為在本質上必須是文化的一部分，則這種分離似乎就無法允許。以王元綱的研究而言，排開了宋明兩代的戰略行為，而只以科舉制度下儒家經典中的「王道」論述，呈現宋明兩代的戰略文化，其實並不是宋明兩代真正的戰略文化，如此自然也就會發現戰略文化對戰略行為沒有解釋力。反過來說，以江憶恩的研究而言，明代中國之所以有「霸道」的戰略文化，也不是出於武經七書的文字，而是出於明朝的「霸道」對外政策，明代中國的戰略文化之所以解釋了明代中國的戰略行為，是因為兩者根本是同一件事，到頭來還是套套邏輯。<sup>⑥</sup>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困境，但並不意味著第四世代所追求邏輯與方法的嚴謹其實不可取，也不意味著戰略文化的研究就只能以第一世代為滿足。戰略文化的研究，應該要設法同時滿足邏輯與方法上的嚴謹，也不違背文化一詞的本意。<sup>⑦</sup>因此，另一種不同於目前四個世代戰略文化研究的新取向，也就有必要展開了。

註⑥ 這可說是戰略文化研究作為建構主義學派一個分支的寫照。建構主義者傾向認為，一種概念即使不可直接觀察，但若可產生可觀察的結果，仍可同意其存在。然而，若是得從戰略行為這可觀察的結果來呈現戰略文化這個概念，再以此概念解釋戰略行為，就成了以戰略行為解釋戰略行為的套套邏輯。這在建構主義者看來等於是為了認識論而犧牲本體論，但這似乎是一種不得已的苦衷。可參閱：Alexander E.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Summer 1987), pp. 352~353.

註⑦ 針對江憶恩的批評，葛雷認為戰略文化應該當作是瞭解行為的情境（context for understanding），而不是尋求對行為的因果解釋（explanatory causality for behavior），雙方是各說各話。可見：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January 1999), pp. 49~6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trategic Cultures Revisited: Reply to Colin Gr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3 (July 1999), pp. 519~523.

## 參、研究架構

### 一、進入第五世代—物質基礎、理念慣性

鑑於第四世代戰略文化研究的缺失與困境，本文嘗試提出另一種新的取向，可以稱之為第五世代，它的特性總括而言就是在物質的基礎上主張理念的慣性，這是來自物理學的比喻，做為第五世代研究的待驗假設，以引導後續的實證檢驗。可分述如後。

首先，戰略文化的本質是理念，是戰略決策菁英們對武力使用所共同享有的集體理念，理念與行為不同，理念是原因而行為是結果。其次，理念抽象而不能直接觀察，故因理念的作用而產生的行為，才能當做被觀察的標的物：就算是思想著述也只是反映理念的行為，而不是理念的本身。那麼，哪些行為反映了戰略文化而該被觀察？這不只是寫作著述這般的行為，而更得是對外政策這樣的行為，對外政策才是戰略文化最重要、最充分的表現。意即，戰略文化可以也應該被觀察到的，就是在一段時間內持續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對此，為了避免以行為解釋行為的套套邏輯，用以呈現戰略文化內容的對外政策，與因為戰略文化而導致的對外政策，兩者在時間上必須區隔、彼此不重疊。意即，前一段時間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是原因，代表戰略文化；後一段時間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則是結果，是戰略行為。<sup>⑧</sup>

不過，之前的行為雖然是之後行為的原因，但這之前的行為自己又從何而來？答案則是物質環境：這些之前行為所反映的戰略文化，可說是建立在物質下層結構上的上層結構。套用建構主義代表性學者溫特（Alexander E. Wendt）的名言，文化雖然本質上是集體的理念，但並不是「理念到底」（“ideals all the way down”），<sup>⑨</sup>物質的因素並不能一概排除。反過來說，戰略文化雖不是憑空而來、有其特定的物質條件為基礎，<sup>⑩</sup>但也不全是物質條件的反映、不是物質到底。當做為基礎的物質條件消失，戰略文化未必同時消失，而可持續存在一段時間，直到新的戰略文化在新的物質條件上

註⑧ 這種安排也處理了建構主義學派所重視的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問題。理念與行為間的關係在研究時，雖被視為是單向的理念是因、行為是果，但行為亦可能回過來塑造理念，成了彼此互為因果的雙向邏輯。不過，理念與行為的相互塑造，仍須由可觀察到的行為模式來呈現，而這樣的行為模式記錄一旦寫下，就不受之後行為的影響，研究遂仍可採取理念（之前的行為）是因、行為（之後的行為）是果的單向邏輯。可參閱：David Dessler,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Summer 1989), pp. 441~473.

註⑨ Alexander E.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 112~114, 135~138, 256.

註⑩ 這正如同王元綱對江憶恩的批評，江憶恩雖然從武經七書中主張中國有「霸道」的戰略文化，卻沒有交代此一文化究竟從何而來。不過同樣的道理裡，若從四書等儒家經典導出中國有「王道」戰略文化，也是犯了理念到底的毛病，沒有交代此一文化究竟從何而來。可參閱：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p. 27.



形成，這一段持續的時間就是理念的慣性。<sup>⑪</sup>當物質的基礎改變而理念的慣性還存在時，才能真正論斷文化對行為是否有影響。易言之，就是在這個物質條件轉變的斷層上，戰略文化才可以做為獨立於物質因素之外的原因，解釋一國的戰略行為。<sup>⑫</sup>

從此可以瞭解到，在第五世代的觀點下，戰略文化還是一種長期累積、持續的理念。那麼，戰略文化跨越的時間維度究竟有多久？這雖得看物質環境的變遷步調而定，但至少得是上百年、超過一般人生命的限度，如此才不會是基於個人的親身經驗。可以這麼說，第五世代的戰略文化概念，雖不會像第三世代那樣短暫只是以數十年甚至十數年計，但也很難像第一世代與第四世代那樣悠久以上千年甚至數千年計，而是介於兩者之間。(不同世代的戰略文化概念，綜合整理如表 1)

表 1 戰略文化的概念：五個世代

	戰略文化的		
	本質	時間維度	觀察標的
第一世代	理念與行為	寬，上千年	寬，一切歷史記錄
第二世代	戰略文化只是象徵性符號，未必對戰略行為有影響*		
第三世代	理念	窄，數十年	中，當代歷史記錄
第四世代	理念	寬，上千年	窄，反映理念的傳統思想著述
第五世代	理念	中，上百年	中，反映理念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

\*第二世代與另外四個世代的性質都不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二、研究時段：為何是清代？

依循第五世代的戰略文化概念，中國的戰略文化就不是兩千年來恆久不變的，而是隨著朝代興衰更迭而有所變化，中國可以有「霸道」的戰略文化也可以有「王道」的戰略文化，兩者可能各自存在於不同的時代。從第四世代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

註 ⑪ 其實，在此所提出的這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正符合戰略文化研究原創者施奈德的見解。施奈德自己並未再進一步研究，甚至還刻意避免再使用戰略文化一詞，是因為他不認同那些在他之後的第一世代戰略文化研究，把戰略文化變成一種比他原先創造時要廣泛得多的概念。施奈德認為，第一世代的戰略文化研究已將「戰略文化」擴大成「文化」了，但他自己當初之所以使用戰略文化一詞，只是指一種戰略取向在原先促成此種取向的條件消失之後，卻有了自己的生命而繼續存在的情況。可參閱：Jack L.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 3~9.

註 ⑫ 從因果邏輯來看，戰略文化若對戰略行為有影響，可以是兩種典型。一是在物質環境許可的範圍內，指出某一個確切的行為選擇，也就是讓戰略文化擔任中介變數的地位，戰略文化的作用不違背物質條件。另一則是無視於物質環境的狀態，而直接影響行為，戰略文化的作用可以違背物質條件的作用。以此觀之，本文提出的第五世代觀點是比較接近後者，戰略文化對行為的影響可以違背物質條件，只是不能無限地違背。可參閱：Ronen Palan, "A World of Their Mak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4 (October 2000), pp. 577~578.

宋、明兩代中國所擁有的，其實是「霸道」的戰略文化，那麼，中國是否曾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中，擁有過「王道」的戰略文化呢？或是說，「王道」的戰略文化，最可能存在於中國的哪一個歷史時期呢？正因為戰略文化有其物質的基礎，「王道」戰略文化所需的物質基礎就是尋找的線索。

對此，西方的經驗提供了一些啓示。其實，就算是所謂「西方」的霸道，武力擴張與壓迫也未達極致，美國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雖然是前所未有的強大，卻願意透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做出自我限制，與其盟邦透過對話與協商化解爭議、尋求共識，而不全以優勢權力強壓脅迫。<sup>③</sup>這就是奈伊（Joseph S. Nye）所談的「軟權力」（soft power），意在發揮美國優越制度價值的吸引力，使美國在領導世界時能更得心應手。<sup>④</sup>美國為什麼需要軟權力？因為美國具有霸權的權力地位。霸權的強大使自己可有餘裕，不必再汲汲營營，霸權的強大也削弱了國際體系中的無政府狀態，因而有利於體系內的和平與穩定，但霸權並沒有強大到可以完全依靠武力威脅與強制手段（否則就不只是霸權而是個世界政府），仍需要某種理念上的輔助力量，以促成出於欽佩、仰慕的主動、自願式服從。如今，美國也不喜歡具有負面意涵的「霸權」（hegemony），而自詡是「領袖」（leadership），<sup>⑤</sup>這種區別正像是「王道」與「霸道」的差別，「王道」的戰略文化可以存在，因為它有利於霸權治理世界。<sup>⑥</sup>

既然「王道」戰略文化需要物質上霸權地位的支撐，則現有第四世代研究以宋朝與明朝為對象就顯得不適當、反映了其所採取的理念到底態度，並非「王道」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案例。宋明兩代雖然儒家思想鼎盛，但宋代的中國根本很難被視為是霸權，甚至也不是最強的國家，而是一個先後受到遼、金、蒙古威逼的二等強權，充其量只是兩極甚或多極中的一極。明朝就算有霸權地位也是相當的薄弱，蒙古加上後來的女真，一直是明朝揮之不去的威脅，僅明成祖在位期間（西元 1403 至 1424 年）才算對蒙古獲得相對優勢，而後不出 30 年明朝就陷入劣勢，甚至遭致皇帝被俘的慘敗。若說中國在東亞地區有毫無疑問的霸權地位，其實是在清代（西元 1644 至 1912 年）期間，清朝本身做為北方游牧民族加上與蒙古的親善友好，清代中國並沒有明代中國那般的長期外患，在極盛時期的勢力也及於新疆、青海與西藏。清朝此一霸權的地位在 18 世以來更維持了約一百年，並非曇花一現。同時，儘管做為異族政權，清朝也透過科舉制度接納了儒家思想，並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sup>⑦</sup>

註 ③ G. John Ikenberry,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3-238.

註 ④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註 ⑤ Joseph S. Nye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July/August 1995), pp. 90-102.

註 ⑥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7-230。

註 ⑦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830-831。

簡而言之，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加在清代中國的霸權地位之上，「王道」戰略文化這才有了物質基礎，清代才最可能孕育出「王道」的戰略文化，清代的戰略行為才最可能受到「王道」戰略文化的影響。而從實踐上，「王道」的確可說是反映在盛清霸權穩固時光的對外政策之中，不似之前的蒙古不斷擴張成為地跨歐亞的超大帝國，清朝在開疆擴土建立霸權之後，並沒有再進一步向中亞、中東、歐洲等地發動「西征」，也沒有渡海攻打日本，這些都是清朝在實際上可以，但卻自我克制而未進行的，這樣的行為模式正是「王道」的表現。

### 三、案例選擇與研究方法：鴉片戰爭的戰略決策過程追溯

不諱言，根據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第五世代觀點，「王道」的邏輯是軟權力有利於霸權治理世界，在盛清霸權穩固時期（大約是 18 世紀），甚至純粹出於物質解釋，就足可說明霸權為何要採行「王道」。唯有當物質基礎消失，但理念還因慣性而延續之際，物質的邏輯與理念的邏輯出現分歧，才能檢驗出戰略文化獨立的解釋效力。因此，在清代最適合檢驗「王道」戰略文化解釋力的時段，就會是物質基礎消失不久，理念慣性最可能還存在的時光，即緊接著霸權餘暉的晚清時期（大約是 19 世紀前半）。於此，1838 至 1842 年清朝與英國因為鴉片問題的爭端與戰爭，就是最適合的案例。此時，是清朝從盛世走向衰弱的歷史轉折點，但在清朝決策當局的認知中，清朝還是強大的「天朝」，碰上了西方「蠻夷」英國前來傾銷毒品鴉片此一惡行，清朝究竟是否奉行「王道」？

如同前文的討論，按照理念慣性的架構，如果「王道」戰略文化確實對中國的戰略行為產生影響，則在衝突開始乃至戰爭爆發、而後終止，吾人應可從兩個方面發現證據。一者，開戰指導。發生爭端後是否立即訴諸武力？決定動武後是否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二者，終戰指導。序戰挫敗後，是否增加交戰強度？是否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如果依據現實主義的觀點，這四個關鍵問題的答案都會是肯定的：既然清朝自認有優越的力量，就會使用這樣的力量以武力解決爭端、壓迫對手，這正是弱肉強食的「霸道」。反之，如果「王道」戰略文化的解釋確實成立，基於王道的和善與寬大，這些關鍵問題的答案都必須是否定的：儘管清朝自認有優越的力量，可以在戰爭中擊敗對手，但以力服人並不能帶來真正的順從，清朝必須展現所謂「天朝」的雍容大度，體諒、開導、教化外邦，才能使所謂的「蠻夷」心悅誠服。（整理為表 2）

依據上述四大關鍵問題的引導，針對 1838 至 1842 年間清朝處理鴉片問題時呈現的對外政策行為模式，本文將採取過程追溯（process tracing）的方法，詳細檢視其戰略決策始末，以斷定「王道」戰略文化是否對戰略行為有影響。在此，本文將以清代的原始史料清實錄與籌辦夷務始末為主要依據，其中詳載了當時清宣宗皇帝（道光皇帝，1782-1850，在位 1820-1850）與各重臣對鴉片問題的戰和決策經過，可從中擷取出所需的關鍵問題答案與證據。

表 2 「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戰略行為是否有影響的關鍵問題

霸權衰落時期：晚清，鴉片戰爭			
關鍵問題		王道	霸道
開戰指導	發生爭端後立即訴諸武力？	否	是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否	是
終戰指導	序戰挫敗後增加交戰強度？	否	是
	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	否	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 肆、實證檢驗

清朝與英國之間因為鴉片的爭端與戰爭，可以道光 18 年閏 4 月 10 日（1838 年 6 月 2 日）黃爵茲上奏查禁鴉片為始，其後幾經折衝、交戰、談判、再交戰、再談判，至道光 22 年 7 月 29 日（1842 年 8 月 29 日）南京條約簽訂為終，期間四大關鍵問題戰略決策的實證研究結果，分述如後（時間以清朝史料中的陰曆日期為準，事件年表與日期對照，可參閱附錄）。

### 一、開戰指導：發生爭端後立即訴諸武力？

有關第一個關鍵問題，發生爭端後是否立即訴諸武力，如果「王道」的解釋成立，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而在史料中也應該要發現這樣的證據：面對英國來華傾銷毒品鴉片造成的貿易與國民健康損失，清朝不僅可以嚴厲地斷然查禁，甚至也可殘酷懲罰各毒梟，即使英國有所反抗，以清朝的「天威」也可以輕易擊敗。只是，考慮到允許外國商人遠來貿易，其實是「天朝」的恩賜，故清朝仍應予以寬限與補償，非到不得已不使用武力。清朝在此一關鍵問題上的決策的確是否定的，而在史料中也的確有證據支持「王道」解釋。清朝在查禁毒品時，強制的執法當然存在，但清朝並不自恃武力而展現出一定程度的自制，儘量合情合理地禁止鴉片。

在黃爵茲上奏查禁鴉片半年後，宣宗於道光 18 年 11 月 23 日（1839 年 1 月 8 日）命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下廣東，與當地負責官員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協力查緝鴉片。依照清朝當時自己的研判，如果要與英國交戰，是勝券在握。這反映在道光 19 年 8 月 17 日（1839 年 9 月 24 日）林則徐與鄧廷楨的上奏中：

…夷兵船笨重，喫水深至數丈，祇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為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及無所施…夷兵除槍礮之外，刺擊、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纏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且該國所都喇噸地方，來至中華需歷海程七萬里，中間過峽一處，風濤之惡，四海所無，行舟至此，莫不鼓慄…又聞該國現係女主，在位四載，年僅二十歲，其

叔父分封外埠，恆有覬覦之心，內顧不遑，窺邊何暇？…而畏強欺弱，是其秉性…臣等察看民情，所由沿海村莊，不但正士端人銜之刺骨，即漁舟村店，亦俱恨其強梁，必能自保身家、團練抵禦…<sup>③</sup>

即使有這樣的敵情判斷，清朝並未斷然使用武力。鄧廷楨與怡良道光 19 年 1 月 9 日（1839 年 2 月 22 日）上奏他們向外商所發布的禁煙公告，其中寫道：

天朝准予各國通商以來二百年，深仁厚澤，美利無疆…天朝本不必通市，而爾各國能一日不通市否？…爾等明目張膽、恣意為奸，又豈能曲從寬宥？必當一體按法懲辦，以示天威。爾等梯航遠涉，原圖將本求利，何苦因利亡身？…如始終執迷不悟、尚存覬覦之念，則是爾等自外生成…唯有奏請封港…查各該國王，恭順有素，而治夷法度綦嚴，設因斷絕茶、黃，則爾等縱漏天朝法網，恐亦難逃本國之法也…。<sup>④</sup>

對此，宣宗認為是「正大周到」。<sup>⑤</sup>道光 19 年 3 月 9 日（1839 年 5 月 2 日），林則徐沒收外商鴉片之後，與鄧廷楨、怡良一同奏報處理情形，並請求宣宗開恩，對外商寬大處理：「…伏思夷人販賣鴉片多年，本干天朝法紀，若照名例所載，化外有犯，並依律科斷之語，即予以正法，亦屬罪所應得。惟念從前該夷遠隔重洋，未及遽知嚴禁，今既遵諭全繳，即與自首無異。合無仰求皇上覆載寬宏，恩施法外，免追既往，言儆將來…」，<sup>⑥</sup>宣宗對此表示同意：「該夷等畏法自首，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sup>⑦</sup>而後林則徐等人又上奏，再請求宣宗恩准繼續通商：「現在各國夷商，業經遵諭呈繳煙土，自應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懷柔…」，<sup>⑧</sup>宣宗也表示同意：「所見是。」<sup>⑨</sup>

隨後，林則徐將沒入的鴉片銷毀，並給予外商茶與大黃作為補償，清朝也頒布了懲罰與寬限的規定。道光 19 年 5 月 5 日（1839 年 6 月 15 日），清朝宗人府宗令敬敏等會議，其中查禁鴉片煙章程三十九條規定：「…吸煙人犯，均予限一年六箇月，限滿不知悔改，蓋擬：絞，監候。…夷商往澳住行，賣貨完竣，及飭遵照定限啟程；如逾期久留，照違制律治罪。…官兵查拏鴉片煙，遇有大夥拒捕者，准放鳥槍，格殺勿論。」<sup>⑩</sup>此外，清朝亦訂出外國人攜帶鴉片入境販售的治罪專條：「此後洋人入帶有鴉片煙入口圖賣者，為首，照開設窩口，例擬『斬，立決』；為從同謀者，從嚴，擬

註 ③ 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 1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頁 516、518-519、521。

註 ④ 同前註，頁 352-357。

註 ⑤ 同前註，頁 357。

註 ⑥ 同前註，頁 388。

註 ⑦ 同前註，頁 389。

註 ⑧ 同前註，頁 390-393。

註 ⑨ 同前註，頁 394。

註 ⑩ 清代實錄館纂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第 9 冊）（臺北：華文書局，1964 年），頁 5774-5775。

『絞，立決』。由督撫審明，交地方官督同該國官長，將各犯分別正法。起獲煙土，全行銷燬，以杜貪頑而嚴法禁。…以奉文之日為始，予限一年六箇月，如於限內將煙土全數呈繳者，免其治罪」。<sup>④⑥</sup>

道光19年7月19日(1839年8月27日)查禁鴉片告一段落後，林則徐、鄧廷楨、與怡良上奏：

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是以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體，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稱者，賴有此也。為是通商已久，眾夷良莠不齊，遂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憤…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已自首者，情尚可原；再犯者，法難屢貸…是以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中國分去，豈有以毒物反害華民之理？…弼教明刑，古今通義，譬如別國人到口英國貿易尚須遵嘆國法度…<sup>④⑦</sup>

對此，宣宗也認為是「得體周到」。<sup>④⑧</sup>以上均顯示，在處理鴉片問題時，清朝儘管自認可以武力取勝，但仍自我克制，對外商販毒仍說之以理、體諒其情，展現「天朝」的寬大。

## 二、開戰指導：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有關第二個關鍵問題，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是否不自我設限，如果「王道」的解釋成立，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而在史料中也應該要發現這樣的證據：儘管清朝以其「天威」可以輕易獲勝，但不加限制地使用武力仍有違「天朝」的寬大，面對英國可能派軍進犯，清軍略施薄懲即可，如果英方有所悔悟即應寬恕，不必趕盡殺絕。然而，清朝在此一關鍵問題上的決策卻是肯定的，支持「王道」解釋的證據更完全不存在於在史料中。清朝查禁鴉片後一年之間，雙方屢有衝突，清朝也開始備戰，此際清朝原先的寬大已經消失，準備在接下來的戰鬥不做保留，痛懲英國。

道光19年5月28日(1839年7月8日)，銷毀鴉片後，英國商船仍違法往來，林則徐遂上奏「請將偷渡洋船嚴行懲辦」，宣宗的指令中對英國的不知感恩，已感不耐：

外國商船來粵貿易，必在該國請領牌照，頒給禁約，方許駛入內洋。乃近年嘆咭喇港腳洋人並未領照經商，往往偷渡越竄，並因中國員弁遇有違禁來洋船隻，不過驅逐而止，膽敢虛張聲勢以槍礮相恐嚇！似此違禁藐法，甚屬可惡。該大臣等奏，請遇有此等越竄船隻，即令師船奮勇剿除，及願募善

註④⑥ 同前註，頁5781。

註④⑦ 同註③⑧，頁498~500、503~504。

註④⑧ 同註③⑧，頁504。

汨，駕船載草，被帶火器，占往上風，漏夜乘流縱放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體察情勢，相機籌辦，務使洋人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為妥善。<sup>④⑨</sup>

道光 19 年 8 月 17 日（1839 年 9 月 24 日），林則徐、鄧廷楨又上奏，報告在鴉片沒收銷毀後，有部分外商因未自首簽具、不能營業，而開始抗議。兩人建議：「鴉片必要清源，而邊釁亦不容輕啟…惟視寬嚴之當否。寬故可以弭釁，寬而失之縱弛，則患轉在養癰；嚴似易於啟釁，嚴而範我馳驅，則小懲即可大誡…」<sup>⑤⑩</sup>對此宣宗表示同意，下令「…密為防範、調度兵弁，亦不可稍涉鬆懈。…悉心商酌，趁此警動之機，力除弊竇…」<sup>⑤⑪</sup>9 月 5 日（1839 年 10 月 11 日），林則徐、鄧廷楨，與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再上奏關於英國人偷賣鴉片、開砲挑釁等情事，宣宗也批示：「既有此番舉動，再是以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機悉心籌度，勉之慎之。」<sup>⑤⑫</sup>11 月 8 日（1839 年 12 月 13 日），林則徐、鄧廷楨再次上奏關於查禁英國鴉片貨船以及雙方衝突事件，其中寫到若英方「苟知悔悟」將「僅許回頭」，但宣宗表示「不應如此，恐失體制」，<sup>⑤⑬</sup>可見清朝至此已無意再施「天恩」。

道光 19 年 12 月 1 日（1840 年 1 月 5 日），林則徐、鄧廷楨再上奏關於禁煙導致雙方的衝突，宣宗更表示「務當趁此警動之機，為一勞永逸之策，置於區區關稅之盈絀，朕所不計也。」<sup>⑤⑭</sup>而後林則徐、鄧廷楨遂開砲轟擊英國船隻，並上奏表示英國人「雖欲明其奉法，究係一片空言」<sup>⑤⑮</sup>，清朝「不與爾國交易，皆由爾之自取，並非天朝無故絕人。爾不悔悟於前，此時懇求已晚…」。<sup>⑤⑯</sup>道光 20 年 3 月 7 日（1840 年 4 月 8 日），林則徐、怡良上奏戰術計畫，表示對付英國「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不必留情，並準備「將平時所裝大小火船，即雇漁蜆各戶，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頭以一二兵弁，於皆雇用此等民人為水勇，先赴各洋島嶼，分投埋伏」，<sup>⑤⑰</sup>宣宗對此表示嘉勉「所辦好」。<sup>⑤⑱</sup>以上亦可見，清朝在英國不感念「天恩」的情況下，遂決定不擇手段、不留餘地，定要痛擊英國。

註④⑨ 同註⑤，頁 5789。

註⑤⑩ 同註③，頁 515～516。

註⑤⑪ 同註③，頁 523。

註⑤⑫ 同註③，頁 537。

註⑤⑬ 同註③，頁 573。

註⑤⑭ 同註③，頁 588～589。

註⑤⑮ 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 2 冊），頁 612。

註⑤⑯ 同前註，頁 613。

註⑤⑰ 同前註，頁 651。

註⑤⑱ 同前註，頁 654。

### 三、終戰指導：序戰挫敗後增加交戰強度？

有關第三個關鍵問題，序戰挫敗後是否增加交戰強度，如果「王道」的解釋成立，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而在史料中也應該要發現這樣的證據：序戰的挫敗雖然可以扳回，但若因此擴大戰事將有損「天朝」的寬大，清朝就是增兵也不一定要反擊，只要造成態勢讓英軍知難而退即可。然而，清朝在此一關鍵問題上的決策卻是肯定的，支持「王道」解釋的證據在史料中也是非常稀少。道光 20 年 5 月間（1840 年 6 月間）英軍抵達之後，略過廣東轉而北上攻擊定海，清朝序戰挫敗之際，宣宗指示增援：道光 20 年 7 月 14 日（1840 年 8 月 11 日）英軍進逼天津大沽口，宣宗最初雖改派主和的琦善與英方談判，撤換、懲辦林則徐，並節制下屬升高戰事的可能行動，但終究不認為林則徐先前的禁煙舉措太過苛刻、有失「天朝」的寬大，而是爭取調整戰備的時間，隨著英軍退回廣州、清軍逐漸動員，宣宗遂一再催促前線進擊。

道光 20 年 6 月 22 日（1840 年 7 月 20 日），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報定海戰況吃緊，宣宗斥責「浙江水陸營伍之廢弛，不問可知，區區小醜，膽敢如此披猖；彼文武大吏，即張皇失措，平日僅知養尊處優耶？」<sup>⑤</sup>並下令軍機大臣等「…定海縣孤懸海外，被圍甚急，該撫自應添撥水師馳往援救」<sup>⑥</sup>隨著英軍進逼大沽口，宣宗的態度是稍有軟化，道光 20 年 8 月 6 日（1840 年 9 月 1 日），福建陸路提督余步雲上奏請求增援，宣宗模稜兩可地下令軍機大臣等「悉心商酌，應否調撥之處，具奏請旨」。<sup>⑦</sup>9 月 3 日（1840 年 9 月 28 日），代理兩江總督的江蘇巡撫裕謙也上奏，希望能痛殲英軍，以振天威：「…義律不誅，兵端不息…江蘇地方雖非該逆必到之地，而臣誓不與共天日…務期誅此逆夷，以快人心而伸天討…」，但宣宗並未批准。<sup>⑧</sup>11 月 1 日（1840 年 11 月 24 日），廣東巡撫怡良上奏，因為英軍遠離故「…查虎門內外各隘口兵勇共有萬人…將次要口隘陸續撤減二千餘名…」，宣宗也未批示制止。<sup>⑨</sup>

此際，琦善與英方在廣東進行和談（和談的決策過程追溯，詳見後文），道光 20 年 11 月 12 日（1840 年 12 月 5 日），廣東方面怡良上奏英軍開砲挑釁，宣宗表示應先自我克制「天朝撫馭夷人，從不失信，既已相約戢兵，且專派欽差大臣前往查辦、代為昭雪，何以於撤防兵船猝加轟擊，如此反覆，是誠何心？」<sup>⑩</sup>但英軍既然已退回廣東，宣宗的態度其實已轉趨強硬。道光 20 年 12 月 10 日（1841 年 1 月 2 日），宣宗批示監察御史石景芬的奏摺，準備升高戰事，可見宣宗的進入談判的真正意圖，只是緩兵之計。石景芬奏道：

註⑤ 同前註，頁 741。

註⑥ 同前註，頁 742。

註⑦ 同前註，頁 932。

註⑧ 同前註，頁 1079~1081。

註⑨ 同前註，頁 1127~1128。

註⑩ 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 3 冊），頁 1261。



…臣仰體皇上好生之德，非不知用兵非聖心止戈之意，然揆諸今日情勢，非威之以兵，則海疆必不得靖，及互市亦必不得成…合江浙兩省兵力，以驅逐一無根島夷，乘其驕惰，出其不意，天威一震，立見殲滅！機會可乘，時不可失也…且沿海要疆數千里，處處可衝突，即處處皆當防禦，曠日持久，老師糜餉，所費何止數百萬也！<sup>⑥</sup>

對於此一主戰的提議，宣宗表示同意，下令積極備戰：「諭軍機大臣等…悉心籌畫，何處必須防守？何處可以進剿？先事豫籌，密為布置，並遴選將弁，準備槍礮，一俟廣東咨照實在情形，即行相機堵剿。兵貴神速，計必萬全，務需一鼓作氣，聚而殲旃。」<sup>⑦</sup>同時，就在談判仍在進行之際，英軍在道光 20 年 12 月 15 日（1841 年 1 月 7 日）攻打虎門口的沙角、大角砲台，對此琦善則一心繼續和談，並在道光 20 年 12 月 28 日（1841 年 1 月 20 日）與英方達成穿鼻草約，宣宗遂撤換、懲辦琦善。

道光 21 年 1 月 3 日（1841 年 1 月 25 日），代理兩江總督的裕謙再次奏上奏，認為時機成熟，應該展開反擊。裕謙指責英國「藉口於斷其貿易，乘我不備，占據定海，以遂其初志，儻不早為收復，則該夷貪詐性成，得步進步，又將顧而之他。是以臣前有乘此天時地利人和，浙江必應速戰、收復定海之議…」<sup>⑧</sup>宣宗批准：「…嘆夷不候回文，兵船直撲虎門礮台，業經降旨…不必俟廣東照會，將自粵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相機剿辦！」<sup>⑨</sup>同時，宣宗決定指派大將奕山，南下迎戰英軍，同年 3 月 27 日（1841 年 4 月 18 日），宣宗見到英方有意求和的奏報，也予以駁回：「嘆人情狀詭譎，反覆無常早經窺破，非大加懲創，何以揚國威而除後患？現在各路調徵兵丁一萬六千有餘，陸續抵粵…何以不痛加剿洗？乃遷就觀望、有意阻撓，汲汲以通商為詞，是復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殊不可解！」<sup>⑩</sup>

整個道光 21 年（1841 年）春季，清朝在廣東屢屢增兵與英軍交戰，但均遭敗績。4 月 6 日（1841 年 5 月 26 日）奕山在廣州投降，雙方達成《廣州合約》，宣宗同意以此緩兵，準備再戰：

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惟當嚴諭該洋官立即將兵船退出外洋，繳還礮台；仍須懷遵前定條例，祇准照常貿易，不准夾帶違禁煙土。儻敢故違，斷不寬恕，並著：將軍等會同該督撫悉心籌議，妥定章程。嘆人叵測，仍須嚴密防範，不得稍有疏懈，俟嘆船退後，迅將各礮台及防守要隘等處，趕緊修築堅固。如嘆人露有桀驁情形，仍當督兵剿滅，不得因已施恩遂

註⑥ 同前註，頁 1361~1365。

註⑦ 同前註，頁 1366~1367。

註⑧ 同前註，頁 1524。

註⑨ 同前註，頁 1528~1529。

註⑩ 清代實錄館纂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第 10 冊），頁 6253~6254。

諸事任其需索…如有喫船駛入內洋，度量礮力能及，即行奮力轟擊，以靖海疆…<sup>⑩</sup>

道光 21 年 7 月（1841 年 8 月）英軍再次北上，攻擊廈門、定海、鎮海、寧波等地，清朝也決定增兵再戰，毫不退讓。道光 21 年 8 月 16 日（1841 年 9 月 30 日），宣宗下令不得怯戰退縮，並要求將英軍趕盡殺絕，不留餘地：

現在新兵壯勇已有二、三萬之多，如果謀勇兼施、兵民齊奮，則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何患不摧枯拉朽、聚而殲旃？…嚴飭水陸將弁，圍集兵勇，或縱大火燒其船隻，或設伏殲其醜類，務使喫船片帆不返，廈門即日收復，尚可稍贖罪戾。儻仍觀望畏葸，任聽喫船自行逃竄，或致貽患他省，…自問當何罪？懷之。…喫人如果呈遞洋書，斷斷不准接交！現在辦理機宜，可堵則堵，可剿則剿。此外更無酌量辦理之法。…喫人如果復來，自當痛加剿洗，即僅數人、數十人登岸，亦當盡殺乃止…。<sup>⑪</sup>

道光 21 年 9 月 4 日（1841 年 10 月 18 日），宣宗決定再派遣大將奕經南下迎戰英軍，但奕經卻遲遲沒有行動，宣宗遂一再催促儘速出擊。道光 21 年 12 月 8 日（1842 年 1 月 18 日）宣宗斥責道：

…水陸壯勇三萬餘名，僅能分據把守，未能出洋攻剿，志切同仇者，不過紳衿數十人，此外非利不動…香港現有喫船十四隻，三板數十隻，漢奸、海盜萬餘人，不時窺伺。該將軍等惟知填塞省河，此外別無良策。現在喫人製造火滾，欲沈水擊打石碇，可見沈石填河亦不能阻其內犯。且填河、鑄礮、團練鄉勇各節，皆地方官應辦之事，又何待將軍參贊為耶？摺內又稱守為上策，攻戰次之，是攻戰既無把握，萬一喫船復來侵犯，未知作何抵禦？儻戰既不敢，守又不敢，經年累月虛糜帑項，該將軍等自問當得何罪？<sup>⑫</sup>

宣宗一再增兵促戰清楚地顯示，他根本無意再寬大對待英國，交戰既然失利就要趕緊以大勝扳回顏面，不是調兵佈防就可罷休。

#### 四、終戰指導：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

有關第四個關鍵問題，是否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如果「王道」的解釋成立，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而在史料中也應該要發現這樣的證據：清朝應認為自己仍能獲勝，但考慮到戰爭破壞將使人民受苦，且英方的要求也是「天朝」之大所可以做出的小小賞賜，因而同意進入和平談判，化解衝突。然而，清朝在此一

註⑩ 同前註，頁 6287-6290。

註⑪ 同前註，頁 6360-6362。

註⑫ 同前註，頁 6489-6490。

關鍵問題上的決策卻是肯定的，支持「王道」解釋的證據在史料中也是非常稀少。主張基於「王道」的寬大與英方談判者，還是只有取代林則徐的琦善，但他會有此建議其實是認為清朝已不堪再戰，「王道」只是他粉飾用的藉口；此外也如同前文所述，琦善的見解並不為宣宗所接受，宣宗派遣琦善談判並不是認為應該展現「天朝」的寬大，而是為了爭取備戰的時間。同時，儘管之後的戰局顯示清軍的確不敵英軍，但宣宗並不認為清朝不堪再戰，而可採用斷絕英軍飲食的後勤戰略對付英軍，不願進入和平談判。

鴉片戰爭期間的談判，主要是在道光 20 年 8 月至 12 月（1840 年 8 月至 1841 年 1 月）。道光 20 年 7 月 14 日（1840 年 8 月 11 日）英軍進逼天津大沽口之際，時為直隸總督的琦善，接獲英軍字據後婉轉地上奏，宣宗雖未斷然拒絕，但仍認為英方動武實屬無理「…文內所求昭雪冤抑一節，自應逐加訪查、處處得實，方足以折服其心…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格外施恩…該夷既欲照常貿易，自宜前赴廣東，叩關陳懇，何得擅駕多船，徑赴定海占據城池？」<sup>⑭</sup>琦善解釋「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現在既由臣接其字據代奏，即可由臣傳旨曉諭，或尚可冀取其信…令其返棹南旋。」<sup>⑮</sup>但宣宗認為這只是英國的詭計，表示「該夷狡獪異常，此時起碇他往，難保不赴山海關及奉天省等處」，並下令「設法堵禦、不准與之接仗，諒無他虞」。<sup>⑯</sup>

琦善仍與英國交涉，然後向宣宗匯報，宣宗認為「所辦俱好，可惡在煙價一條，甚費周章也。」<sup>⑰</sup>在這個情況下，琦善再繼續進行交涉，打算勸誘英軍離開大沽口，返回廣東。他奏道：「天津拱衛神京，已屬扼要之區，且近接盛京，尤為根本重地，欲求處處決勝，時時常勝，臣實不免隱存意外之虞…長江又所在可通，是險要已為該夷所據，水師轉不能入海窮追。且本年經擊退，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我皇上日理萬幾，更不值加以此等小醜跳樑，時殷宸廑。而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sup>⑱</sup>這樣的見解獲得宣宗同意，琦善遂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於道光 20 年 9 月 8 日（1840 年 10 月 03 日）轉赴廣東，與英國繼續談判詳細和平條款。

英軍離開大沽口，對首都北京的立即威脅解除後，琦善的和談策略遂不為宣宗所接受。道光 20 年 12 月 2 日（1840 年 12 月 25 日），琦善逐條報告在廣東與英方和談的情況。琦善認為清軍廢弛已久，不堪作戰：「…即水師營務，微特船不敵夷人之堅、礮不敵夷人之利，而兵丁膽氣怯弱，每遇夷師船少人稀之頃，輒喜事貪功；迨見來勢強橫，則皆望而生懼。」至於英方在商務方面開出的條件，琦善覺得可以接受，但租地一事，琦善一方面雖認為以「天朝」之大，給予英國一塊小小的彈丸之地可彰顯「天恩」，但又擔心英國人以此租地為據點滋事，而陷入兩難。琦善奏道：「…惟請給地方之說，若仰沐聖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結黨成群、建臺設礮，久之漸成占據，

註⑭ 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 2 冊），頁 886~887。

註⑮ 同前註，頁 914。

註⑯ 同前註，頁 915。

註⑰ 同前註，頁 961。

註⑱ 同前註，頁 1027~1028。

遺患將來，不得不先為之慮…。<sup>⑦</sup>宣宗對此則訓令琦善繼續談判、伺機進擊：「看此光景，該逆夷反覆鴟張，恐難以理喻諭，必當一面論說；一面準備，多方羈絆。待其稍形疲憊，趁機剿裁，方可制服。」並強調：「若不趁機痛剿，何以示國威而除後患？…一面與之論說，多方羈絆；一面妥為豫備，如該夷桀驁難馴，即乘機攻剿，毋得示弱」。<sup>⑧</sup>

琦善則在未獲宣宗同意之下，先答應了英方的條件，也就成為《穿鼻草約》。琦善之後在道光 20 年 12 月 14 日（1841 年 1 月 6 日）再次上奏，敘述同意英方煙費的索賠、戰俘的歸還等，都可表現「天朝」的寬大，請求宣宗批准，但仍被宣宗駁回。琦善奏道「…奴才不揣冒昧，擬將廈門、福州酌准通商…」，宣宗對此十分光火「憤恨之外，無可再論！」<sup>⑨</sup>並在批示中寫到「婉轉開示，卿實費盡苦心，但此時勢，斷不能不加征剿！其他概勿論也！」<sup>⑩</sup>宣宗也質問琦善「有何棘手之處？祇欲卿相機剿辦，逆夷授首，以彰國威，以成懋績，勉之又勉。」並下令「逆夷日肆猖獗，必應痛加剿洗！」<sup>⑪</sup>琦善遂被解職、懲處。

琦善獲罪後，向宣宗解釋並懇求停戰，表示會有此舉乃因不忍民衆受戰火之苦，且清軍其實無力再戰。他奏道：「…此間水師廢弛，已非一日，雖…竭力鼓勵兵心，而積重難返，究多畏葸…」，而且「…同城之將軍、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州，暨前督臣林則徐、鄧廷楨等，僉稱藩籬難恃，交鋒實無把握。且所有奉調各兵，遠道而來，尚須時日，並不能同時到齊，而大兵經過，勢不能無風聲，漢奸即早為走漏消息，該夷必先肆猖獗。」<sup>⑫</sup>對此宣宗則大加怒斥：「朕斷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戲弄、迷而不返！膽敢背朕諭旨，仍然接遞逆書！…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復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難之民人，切齒同仇、神人共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討而示國威？」<sup>⑬</sup>

道光 21 年 2 月 14 日（1841 年 3 月 6 日），宣宗再次數度痛斥已被革職的琦善，宣宗雖自稱「前因嘆人在天津投遞洋書，聲稱訴冤，朕維仁育義正，不分華洋，特命琦善赴粵查辦，並諭…暫緩進兵」，<sup>⑭</sup>但從宣宗寸土不讓的態度可見，宣宗根本無意彰顯「天恩」、寬大地進行和談，而是一心嚴懲英國。

…嘆人盤踞香港，稱係琦善說定讓給，已有文據，並擅發告示，稱該處百姓為嘆國子民，覽奏殊甚痛恨。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敵乞恩！且伊被人恐嚇

註⑦ 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 3 冊），頁 1354。

註⑧ 同前註，頁 1355。

註⑨ 同前註，頁 1380。

註⑩ 同前註，頁 1515。

註⑪ 同前註，頁 1520。

註⑫ 同前註，頁 1603、1686~1687。

註⑬ 同前註，頁 1689~1692。

註⑭ 清代實錄館纂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第 10 冊），頁 6208。

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sup>⑧</sup>

談判破裂後，除前述道光 21 年 4 月至 6 月（1841 年 5 月至 8 月）的暫停，戰事從道光 21 年 1 月（1841 年 1 月）一直持續至次年 6 月（1842 年 8 月），期間清軍一再失利，但宣宗並不認為清朝不堪再戰。道光 21 年 9 月 22 日（1841 年 11 月 5 日），宣宗對於戰局作出分析與指示：「…噶人每到一處，先用大礮轟擊，奪據礮台，再行搶掠，是其故智。濱海人煙稠密，我兵沿岸結營，後路又無接應，豈非束手就敵？廈門等處失事，皆由於此。…將該處居民勸令遷移，令其無可肆掠…」<sup>⑨</sup>道光 22 年 5 月 12 日（1842 年 6 月 20 日）戰爭末期，宣宗仍認為還有勝算，即使清軍在戰鬥中不敵英軍，但英軍長期遠征必定水土不服，只要斷絕其飲食，飢渴加上疫病，英軍將不戰自潰。宣宗下令：

噶人赴各島取用淡水，應令無水可取，以制其命…飭令地方官親赴各島，將瀑布、流泉，或散其脈絡，或使之伏流，勿使噶人得汲取之便。島內井眼，應運石於旁，偵探噶人來時，其常用之井，即將石塊填塞井眼。其居民不用之井，或臨時投以毒藥，俾令服之自斃。仍當暗為記認，俟噶人去後，得以設法淘汰淨盡…飭沿海各旗、民、地方官，將噶人需用淡水食物，嚴行杜絕，自足以致其死命…。<sup>⑩</sup>

從此可以看出，宣宗一直以來是不惜使用堅壁清野的持久戰來擊敗英軍，既然清朝仍堪再戰就不願談和，不考慮以「天朝」的寬大與英國和解。宣宗最後在道光 22 年 6 月 14 日（1842 年 7 月 21 日）鎮江失守後決定和談，是因為他至此認為清朝已不堪再戰，只好接受城下之盟，並非寬大施恩。道光 22 年 7 月 13 日（1842 年 8 月 18 日），宣宗承認：「…復查噶人自犯順以來，命將出師，總未能挫其兇鋒…與其兵禍連結，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請，以保大局…」。<sup>⑪</sup>

## 五、研究發現概況

綜合以上史料證據，在四大關鍵問題決策的過程追溯中可以發現，「王道」文化的解釋，雖遭其中三個關鍵問題的答案否定，但仍獲得第一個關鍵問題的答案支持。可整理為表 3。

註 ⑧ 同前註，頁 6198～6199。

註 ⑨ 同前註，頁 6412。

註 ⑩ 同前註，頁 6658、6685。

註 ⑪ 同前註，頁 6765～6766。

表 3 研究發現概況

霸權衰落時期：晚清，鴉片戰爭			
關鍵問題		實際決策	王道解釋的證據
開戰指導	發生爭端後立即訴諸武力？	否	有
	決定動武後對交戰強度不自我設限？	是	無
終戰指導	序戰挫敗後增加交戰強度？	是	極少
	不願在仍堪再戰時進入和平談判？	是	極少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 伍、結 語

歷來有關中國「王道」與西方「霸道」之別的見解，往往缺乏嚴謹的實證檢驗，雖有研究嘗試突破這樣的缺失，以有系統的方式呈現中國歷史上的證據，以宋朝、明朝為「王道」戰略文化解釋最可能成立的案例，來駁斥這「王道」不同於「霸道」的論點，但這樣的實證研究仍然只佔相對的少數，且仍存有概念與方法上的缺陷。因此，本文提出了物質基礎、理念慣性的觀點，指出「王道」戰略文化不是憑空而來，而需要霸權的物質基礎；而當霸權的物質基礎消失，但「王道」仍因理念的慣性而延續之際，才可呈現戰略文化的獨立解釋力。因此，「王道」戰略文化解釋真正最可能成立的時代其實是清代，而晚清時期清朝從霸權地位跌落之際，就是檢驗「王道」戰略文化解釋力的最佳時段。從此，本文以晚清的鴉片戰爭為案例進行實證檢驗。本文發現，儘管並無全面、壓倒性的證據支持「王道」的解釋，但確實有部分明顯的證據指出，清朝的行為是受到「王道」文化的影響。在此一中英戰爭中，「王道」的確扮演了角色，「王道」戰略文化確實存在。在雙方因鴉片問題產生爭端時，清朝一開始是願意秉持其「天朝」的寬大進行處理，但在英國並不感念「天恩」的情況下，清朝遂決定痛加嚴懲，在最初的挫敗之後一再增兵尋求反擊，進入談判也只是緩兵之計，不再願意以寬大恢復和平。這似乎指出，「王道」戰略文化無法是一種無限的寬容，需要爭執雙方的共同接受，才會全面呈現在衝突過程的戰略行為之中。易言之，僅以目前的研究發現，並不能全然否定戰略文化的作用，還需要進行更多詳細的案例研究，往前擴及盛清時清朝與周邊小國的衝突案例，往後擴及晚清時清朝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衝突案例，方可更進一步檢驗「王道」戰略文化對中國戰略行為的影響，進而有助於吾人瞭解並掌握崛起後中國可能的戰略行為模式。

\*

\*

\*

（收件：100 年 3 月 1 日，修正：100 年 4 月 10 日，接受：100 年 10 月 24 日）

## 附錄 鴉片戰爭大事年表 1838~1842

<b>道光十八年</b>
閏四月十日（1838/06/02）鴻臚寺卿黃爵茲上禁煙奏摺。
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01/08）命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南下廣東緝煙。
<b>道光十九年</b>
一月十六日（1839/03/01）林則徐抵廣東開始緝煙。
二月七日（1839/03/21）林則徐通告行商繳煙，外商共繳出1,037箱鴉片。
二月十日（1839/03/24）林則徐暫停貿易，封鎖商館，限制350名外國人行動。
二月十四日（1839/03/28）外商妥協，交出20,283箱鴉片，英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於商管封鎖期間撰寫報告，英國當局瞭解情況後，外相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有意出兵。
四月二十二日（1839/06/03）林則徐虎門銷煙，並犒賞英人茶及大黃。
五月二十七日（1839/07/07）九龍尖沙嘴英人醉酒鬧事，擊傷村民林維喜，林維喜次日死去。林則徐令義律交兇，義律不從。
七月七日（1839/08/15）林則徐以義律不交兇派兵進入澳門，禁止供應英人糧食，逼迫英人選擇交兇或撤出。
七月十八日（1839/08/26）英方撤出澳門。
七月二十三日（1839/08/31）林則徐正式下令清朝居民可以武力拒絕英人上岸取水、覓食。
七月二十七日（1839/09/04）義律率3艘小船至九龍交涉未果，於是開砲。
十一月十八日（1839/12/23）宣宗下詔終止一切中英貿易。
<b>道光二十年</b>
五月三日（1840/06/22）英國海軍集結完畢，自澳門水域北上，攻取舟山。
六月七日（1840/07/05）定海失陷。
七月十四日（1840/08/11）英軍抵達天津大沽口，直隸總督琦善出面處理。
八月十八日（1840/09/13）琦善成功勸阻英方，並使其南下廣州再議。
九月三日（1840/09/28）林則徐交部嚴加議處。
九月八日（1840/10/03）琦善南下廣州與英國商議。
十二月十五日（1841/01/07）英國於協商過程中攻打虎門口的沙角、大角砲台。
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01/20）達成《穿鼻草約》，宣宗震怒，和談破裂。
<b>道光二十一年</b>
一月八日（1841/01/30）授奕山「靖逆將軍」，南下迎戰英軍。
一月二十一日（1841/02/12）授楊芳參贊大臣，南下迎戰英軍。
一月二十五日（1841/02/16）琦善交部議處。
二月三日（1841/02/23）虎門之戰再起。
二月六日（1841/02/26）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虎門之戰結束。中英雙方以廣州為主要戰場展開對抗。
二月二十六日（1841/03/18）英軍重佔廣州商館。
閏三月二十七日（1841/05/17）義律下令全面進攻廣州。
四月六日（1841/05/26）奕山於廣州投降。雙方簽署《廣州合約》，但英方認為仍有後續談判的必要。
四月十一日（1841/05/31）巴麥尊啟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代替義律。

六月二十四日 (1841/08/10) 璞鼎查抵華並發出照會，希望繼續進行《廣州合約》中後續部分，如果無法滿意，將派兵北上。
七月六日 (1841/08/22) 璞鼎查北上。
七月十日 (1841/08/26) 廈門之戰起。
七月十一日 (1841/08/27) 廈門清軍戰敗。
八月十二日 (1841/09/26) 定海之戰起。
八月十七日 (1841/10/01) 定海失陷。
八月二十六日 (1841/10/10) 鎮海失陷，欽差大臣裕謙陣亡。
八月二十九日 (1841/10/13) 寧波失陷。
九月四日 (1841/10/18) 授奕經「揚威將軍」，南下迎戰英軍。
<b>道光二十二年</b>
一月二十九日 (1842/03/10) 奕經在浙東發起反擊。
二月五日 (1842/03/16) 浙東反擊失敗。
二月十七日 (1842/03/28) 命耆英為杭州將軍，前赴浙江。
二月二十七日 (1842/04/07) 命耆英為欽差大臣。
三月五日 (1842/04/15) 耆英、伊里布南下。
三月二十九日 (1842/05/09) 耆英抵達杭州。
四月九日 (1842/05/18) 乍浦失陷。
四月十七日 (1842/05/26) 英軍發出停戰條件的照會。
四月三十日 (1842/06/08) 寶山、吳淞失陷。
六月五日 (1842/07/12) 鎮江之戰起。
六月十四日 (1842/07/21) 鎮江失陷。
六月二十日 (1842/07/27) 宣宗決定和談。
七月三日 (1842/08/02) 英軍北上南京。
七月三日 (1842/08/08) 伊里布家奴張喜擔任清朝和談代表。
七月九日 (1842/08/14) 張喜和談效果不佳，耆英、伊里布親自與英人談判。
七月二十九日 (1842/08/29) 《南京條約》簽訂。

資料來源：清代實錄館纂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第 9-10 冊）；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 1-3 冊）；茅海建，天朝的崩潰（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中西方日期對照根據：「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西元元年 2 月 11 日至 2100 年 2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http://sinocal.sinica.edu.tw/>。



# Material Basis, Ideational Inerti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ese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1838~1842

*Shih-yueh Y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is the convergence of theoretical debates between re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which drives the policy debates on the means to deal with the rising China. Following the tradition of realism, a rising China will favor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undermining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In contrast,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the realist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ignores the role of culture on state's behaviors thus an incomplete assertion based on the Western experience only. In fact,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different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 “benevolence”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hegemony.” Only when this unique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is considered can one understand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 Nonetheless, this “benevolent/hegemony” argument often lacks rigorous empirical testing. Some attempts were made by presenting historical records of China's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two most likely resemblances for strategic culture explanation. However, such empirical researches are relatively rare and contai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laws. Did Chinese “benevolent” strategic culture ever make an impact on China's strategic behavior?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material basis/ideational inertia perspective on the strategic culture and takes the Opium W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true resemblance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cultural explanation.

**Keywords:** realism; constructivism; strategic culture; material; ideation; use of force

### 參考文獻

- 「兩千年中西曆轉換 西元元年 2 月 11 日至 2100 年 2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http://sinocal.sinica.edu.tw/>。
- 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 1-3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
-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
- 清代實錄館纂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第 9-10 冊）（臺北：華文書局，1964 年）。
- 楊仕樂，「中國獨特的戰略文化？尋找理念的物質基礎」，*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197~230。
-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 Desch, Michael C.,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9), pp. 141~170.
- Dessler, David,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Summer 1989), pp. 441~473.
- Dittmer, Lowell, "The Culture of Structural Realism,"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9, No. 1 (Winter 1997), p. 194.
- Feng, Huiy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7).
- Gray, Colin S., "Out of the Wilderness: Prime Time for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6, No. 1 (January 2007), pp. 1~20.
- ,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ory Strikes Back,"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1 (January 1999), pp. 49~69.
- Ikenberry, G. John,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3~238.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16~268.
- , "Strategic Cultures Revisited: Reply to Colin Gra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3 (July 1999), pp. 519~523.
- ,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 ,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Jones, David M. and Mike L. Smith, "Noise but No Signal: Strategy, Culture, and the Poverty of Constructiv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4, No. 6 (November 2001), pp. 485~495.

- Kristof, Nicholas D.,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 September/October 1993 ), pp. 59~74.
- Lantis, Jeffrey 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 Autumn 2002 ), pp. 87~113.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
- Nye, Joseph S. Jr.,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 July/August 1995 ), pp. 90~102.
- \_\_\_\_\_,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Palan, Ronen, "A World of Their Mak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4 ( October 2000 ), pp. 575~598.
- Scobell, Andrew,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 Carlisle: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
- \_\_\_\_\_, "Soldiers, Statesmen, Strategic Culture and China's 1950 Intervention in Kor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 November 1999 ), pp. 477~497.
- \_\_\_\_\_,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Snyder, Jack L.,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 Santa Monica: Rand, 1977 ).
- \_\_\_\_\_,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 pp. 3~9.
- Sondhaus, Lawrence,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 Wang, Yuan-k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 March 2004 ), pp. 173~201.
- \_\_\_\_\_,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
- Wendt, Alexander E.,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 Summer 1987 ), pp. 335~370.
- \_\_\_\_\_,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Zhang, Shu Gu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Zhang, Tiejun,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Traditional and Present Features,"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21, No. 2 ( April/June 2002 ), pp. 73~90.

